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第四辑•

教会大学 与 神学教育

徐以骅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吴梓明主编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
(第四辑)

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

徐以骅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丛书主编：吴梓明

丛书责编：黄旭

本书责编：陈天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徐以华编.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11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

ISBN 7-5334-2934-6

I. 教… II. 徐… III. 基督教-宗教教育-研究-中国-文集 IV. I5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802 号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

(第四辑)

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

徐以华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泉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泉州新华路 29 号 邮编：362000)

850×1168 32 开本 6.75 印张 163 千字 2 插页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2000 年 5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201—2700

ISBN 7—5334—2934—6/G·2387 定价：13.70 元

如发现印装差错，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总序一	(1)
总序二	(6)
自 序	(11)
第一章 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	(19)
一、基督教神学教育的开始	(20)
二、教会大学神学教育的形成	(26)
三、20 世纪 10 年代神学教育的进展	(30)
四、20 世纪 20 年代的神学教育调查	(35)
五、大学神学与独立神学之比较	(41)
六、1935 年韦格尔神学教育报告	(48)
七、抗战以来教会大学的神学教育	(55)
八、结语	(60)
第二章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	(68)
一、司徒雷登与神学教育	(69)
二、首任华人院长刘廷芳	(77)
三、学院的灵魂赵紫宸	(89)
四、全盛时期的宗教学院	(96)
五、师多生少的困境	(104)
六、院校分离的风波	(112)
七、捉襟见肘的财政	(119)

八、回归大学和教会·····	(131)
九、结语·····	(146)
第三章 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	(152)
一、教育与宗教的双重目标·····	(153)
二、圣约翰大学的宗教教育·····	(165)
三、圣约翰大学神学院·····	(174)
四、结语·····	(185)
附录一 主要外国人名汉译表·····	(194)
附录二 主要参考资料·····	(198)

总 序 一

基督教传入中国，可分四个时期：即唐代的景教为第一时期；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为第二时期；明代的罗马天主教为第三时期；及至清代的基督教为第四时期。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始自 19 世纪，英人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于 1807 年来华传教之时。由于中国当时采取闭关政策，严禁传教士进入境内传教，马礼逊牧师只得在马六甲开办一所教会学校，时为 1818 年，该校名为“英华书院”。办学之初，马礼逊的理想有二：一是为促进欧洲与中国间语言文学上的相互沟通，让欧洲人士可以学习中国的语言及文学，也让华人可以学习英语，接受西欧文学与科学成就；二是透过学校教育，促进基督教思想在东亚和平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开始积极在中国大陆兴办学校。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传教的热诚，要促使“中国基督教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借助在政治上取得的优势，可以在各通商口岸兴办学校，教会学校的数目因而剧增。根据晏文士（Charles Keyser Edmunds）《中国现代教育》一书的报道，1918 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已达 6 000 所，学生超过 15 万人，分布如下：

学校类型	数 目	学生人数
幼稚园	15	3,196
初级小学	5,276	133,826
高级小学	575	19,605
中学	233	12,533
专上学校	28	1,499
师范学校	56	不详
神道学校	31	985
职业学校	40	1,409
孤儿院	49	1,544

基督教教育事业因此构成了中国教育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的幼稚园、中小学、师范学校，以至大学及研究院校，先后有 100 多年的岁月，在中国教育、文化、医疗、科技、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至深且巨。今日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交流史，甚至是近代中国政治史、近代科学发展史、法律史或建筑史等，都可以在不同层面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与基督教有关的课题。至于基督教教育的资料也逐渐地成为近代学者所留意和重视的目标，并作为他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80 年代开始，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学者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兴趣愈来愈浓厚，尤其在基督教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更有显著的成就。1989 年 6 月，在武汉举办中国 40 年来首次“中国教学大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章开沅教授对国内基督教教育史研究有如下评价：“无庸讳言，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

为如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抨击。”他接着补充说:“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判虽不无事实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及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

近年来,国内学者先后多次举办国际性研讨会,即如1991年6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研讨会”;1993年10月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1994年3月在四川大学举办“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研讨会正是反映出中国学者正视过去的基督教教育事业,重新肯定基督教教育事业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及成果。福建师范大学高时良教授在他的近著《中国教会学校史》一书中,明确指出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品”。至于近代学者应如何看待基督教教育的问题,高教授认为“应当全面地看问题,对它进行科学分析与总结。……既否定教会教育中的消极因素,又肯定其值得参考的经验,做到实事求是,对其办学成绩和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换言之,国内学者已积极采取客观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从事中国近代基督教教育史的研究。

为了肯定国内学者近年研究的成果,以及进一步推广有关基督教教育的研究,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决定出版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促进会成立宗旨有三:一、联系香港及世界各地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工作者,并借资讯促进彼此之交流;二、推动教会关注宗教教育,加强联络网;三、普及基督教教育研究的成果。该会自1989年在香港成立以来,曾积极接触从事教会工

作或教育研究的信徒和学者,建立沟通的桥梁,达至相互的交流、促进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发展。除分别举办学术讲座、座谈会、训练课程、研讨会外,还有出版《通讯》和编撰《迈向九十年代的基督教宗教教育》专书等工作,备受香港教育界尊崇。

至于国内联系方面,近年经常主动与国内学者接触,参与国内举办有关基督教教育各种学术研讨会,由是加强两地学者交流往来的机会。本丛书的出版计划缘起于1994年3月在成都四川联合大学举行的“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其中一些来自大陆不同地区和香港的学者,相聚间谈起国内有关基督教教育研究的专论著述不多,尤以丛书形式出版的专书更少。鉴于现代中国社会极需有较客观、更科学化及实事求是的研究著作,应在有关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的课题方面作出深入研究,有见及此,学者建议彼此携手,共同撰写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以补这方面学术著作的不足。于是各位学者推举本人为丛书的主编,负责联系大陆、香港两地具有学术水平、专门研究基督教教育的学者,并策划有关出版事宜。本人适任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主席,蒙学者们错爱,遂答应肩负出版丛书的重任。返回香港后,本人先后联系大陆、香港学者共九位,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史静寰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周洪宇博士、山东大学历史系陶飞亚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王立新副教授、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徐以骅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系高时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谢必震副教授、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黄新宪先生及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李志刚博士。他们均同意参加此项计划,并约定分工编撰下列七册专著:

- (一)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 (二)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
- (三)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

(四)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

(五)吴梓明:《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

(六)周洪宇:《基督教教育与中国教育的发展》

(七)李志刚:《基督教教育与中国出版事业》

这项丛书出版计划,标志着大陆、香港两地学者首次携手合作,共同撰写有关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课题的专论。丛书的特色除了由两地学者共同撰写外,更是十分注意客观的研究及事实的陈述,尤其是从正面、系统地探讨西方传教士过往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1807~1952),在中国社会所提供的基督教教育(包括教会或差会所办之中、小及大学机构),以及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各位作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多层次去探讨,目的是要将基督教教育过往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影响作出客观的论述和阐释,冀能引发更多学术思想的交流。本丛书为能符合一般学术著作的要求,各书均附有详细的注释和参考书目,以便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丛书得以顺利完成,实赖各位作者的衷诚合作,不负所望,完成艰苦的撰写工作。1995 年初,适逢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从事学术访问研究,借此难得机会,我们恭请章开沅教授执笔,为丛书作序,获赠鸿文,使丛书增添无限光彩,谨此衷心铭谢。

本丛书能如期出版,我们更须感谢香港圣公会诸圣堂慷慨捐助教育专款作为丛书出版经费,并蒙福建教育出版社支持出版,乃底以成,谨此志谢。

吴梓明

于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

1999 年 5 月 21 日

总 序 二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是源远流长且具有普世性的重要宗教之一。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也有一千多年的漫长历程，其间虽然多经严重挫折与长期停顿，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 20 至 30 年代间，又复得到比较明显的发展。基督教的信徒虽然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佛、回、道等业已完成本土化的各大宗教，但由于其兴办的各项事业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媒体，因此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亦未可低估。

教育是基督教在华事业的重要部分，除了神学教育外还包括各个种类与各个层面、各种形式的世俗教育，而对中国社会影响更大的正是世俗教育。这不仅是就学校和师生总数而言，更重要的是世俗教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直接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无可讳言，早期的较低层次的基督教教育，多半是为传教或培养宣教人才而兴办。其中有些草创阶段的学校还具有救济与慈善性质，当然救济与慈善也被视为传递福音的信息，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基督教的传播。由于 19 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在华传布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支持与庇护，许多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

而且持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态度，有些人甚至直接为殖民主义的侵略活动服务，所以“中华归主”之类的口号自然会受到中国民众的厌恶与抗拒，被解读为西方侵略者“征服中国”的同义语，乃至激起 20 世纪 20 年代风起云涌的非基督教运动，而基督教各类教育事业亦曾受到严重的冲击。

但是，与任何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都存在着冲突与融合、排斥与接纳两种趋向一样，上述情况只是基督教在华事业遭遇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基督教内部也存在着逐渐加强理解、吸收中国文化的顺应趋向，与此相应的则是很早就出现了中国基督教“自传、自治、自养”的主张，以及其后“本色神学”探讨热潮的兴起。历经多次反复的激烈碰撞乃至对抗，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开始，以各级基督教学校向中国政府教育部门注册为标志，基督教教育迅速走上本土化、世俗化和知识化的道路。对于这条道路的选择，其利弊功过在基督教内诚然有激烈的争议，因为世俗化的结果必然是教育功能的迅速彰显与宗教功能的日益淡化。但从基督教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自身发展而言，唯有世俗化才能赢得政府与民间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否则便很难承受公立学校与其他私立学校的强力竞争，甚至连继续存在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前些年我在美国教书时，有的天主教大学知道我正在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便邀请我参加座谈会。我曾谈到中国教会大学之所以一度得到迅速发展，是由于它们的决策注意到：（1）努力满足社会需要；（2）利用有限资源，着力办好两三个领先于全国的有特色的专业，决不追求“大而全”。这些天主教大学的同事对此倍加赞赏，因为他们的学校也正面临类似的困难抉择；而从学校自身来说，存在与发展毕竟是性命相关的首要问题。后来我到台湾东海大学访问，知道夜间部的创办对该校的发展厥功甚伟，但却受到有些教会人士的指责，称之为“不务正业”、“偏离了办

学宗旨”。这或许也可以看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世俗化问题的争议在台湾的延续。

但无论如何，世俗化毕竟为基督教教育事业增添了活力，开辟了通向社会并为社会所认同的道路，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虔诚而多少流于偏执的基要派必然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他们认为福音的传播主要得靠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对话，颇为近似传统儒学所一贯提倡的“内省”。但现代神学的诠释早已多元化，把基督教精神外化为世俗精神，把“Serve God”与“Serve the Society”统一起来，把“与上帝对话”溶于“与人民对话”之中，也未尝不能促使基督教得到复兴，至少是可以发扬基督教文化的优良部分。或许可以说，也正因为如此，基督教教育才能对中国社会的走向现代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吴梓明博士主编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经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鼎力协助出版，正好为我们研究上述这些问题提供一套重要的参考书。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多年从事基督教教育研究的学者，他们分别从中国知识分子、科学文化事业、教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出版事业、近代妇女、社会服务等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这些选题虽然未能包括基督教教育的全部内容，但是大体上涵盖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主要方面。因此，通过这套丛书，读者对于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将可获致比较客观而又深刻的认识。

我对基督教教育的研究侧重于高等层次，深感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十余所大学很有成绩，在专业人才培养与新型学科的开拓两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如果仅就教会大学的教育功能着眼，它们与亚洲其他地区的教会大学相比较，自有其优胜与成功之处。正如一些中外学者所曾指出，教学大学已经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

用，不仅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才，开创了许多新兴学科，而且它们的校园、建筑、设备、图书乃至留校服务的师生，仍然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继续作出贡献。同时，教会大学还留下许多成功的或失败的办学经验，这也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只要加以正确总结，便可成为当前深化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借鉴。

1979年以来，由于出国机会较多和任职学校的历史渊源，使我得以结识许多以前曾经在中国教会大学长期服务的教职员及其子女。根据我的了解，他们虽然在1950年前后离开中国，但绝大多数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衷心希望中美两国恢复正常邦交与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以燕京大学夏仁德教授(Dr. R. Sailer)为例，他不仅敢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公开同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新中国代表握手祝贺，而且还不顾横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的威胁，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强烈谴责美国飞机轰炸上海的野蛮行径。1982年秋天，我有幸在华盛顿郊区他的儿子家里小住数日，这位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第二代”，当时正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繁忙的律师业务之余，尽心尽力地推动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我们曾一起满怀激情地大唱当年流行于教会大学校园的各种歌曲，包括迎接解放的革命歌曲。歌声使我们回到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歌声也唤醒了我们之间沉睡已久的固有情谊。类似的事例我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无论是我个人的生活体验，还是通过中外历史研究的心得，我永远相信世界上的好人占绝大多数。对于那些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青春，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的外籍教会人士，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以应有的尊敬。

我之所以要说这些似乎“题外”的话，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评价常失于偏颇，而其实对它们的切实研究非常不够，甚至缺乏起码的了解。现在，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力求

客观地、也更为超越地研究这个历史课题，使人们获致比较符合当年实际的全面理解。基督教并非专属于西方，它也属于世界，是人类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老是把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其实它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已经逐步融入中国社会，充其量只是有时间长短、程度深浅、范围大小的差别而已。基督教教育，经过几代中外人士一百多年的努力，早已不是外来事物，而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不加珍惜而随便唾弃。即使是基督教神学教育，除狭义的教育功能外，更具有满足一部分人民灵性生活需要的宗教功能，我们也不可以简单粗暴的态度随意加以否定。我认为，基督教教义的正常宣传，特别是多年以来基督教内有识之士对于汉语神学的艰苦探索，也属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互融合，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丰富与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大力提倡研究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加强对基督教文化，特别是中国基督教文化的研究，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然有益于当前的人文精神重建。

是为序。

章开沅

于香港马料水客舍

1995年夏

自序

近年来，大陆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由冷转热，与香港、台湾等地区在此领域不断深入的研究，互相呼应。然而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海外学界，对有“宣教事业冠冕”之称的基督教神学教育，尤其是处于中国神学教育金字塔尖的教会大学神学教育，却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便是拾漏补缺，对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神学教育，作一概述。

研究教会大学神学教育，首先碰到的问题便是如何界定神学教育。神学教育有广义和狭义、非正式和正式之分。据最早研究基督教在华神学教育史的学者、福州美国公理会教士黎天锡 (Samuel H. Leger) 的研究，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从一开始便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学徒式 (apprenticeship type) 神学教育，其特点是注重圣经和宣道实践，通常由宣教士个别传授；另一种是学院式 (academic type) 神学教育，其特点是强调神学和以神学为中心的文科训练，通常为正式的学校教育。^①

黎氏认为，此两种模式的神学教育各有千秋，且并行发展，贯

① Samuel H. Leger, *Education of Christian Ministers in China, A History and Critical Study* (Shanghai, 1925), 1~40.

穿于基督教在华神学教育史的始终。不过到本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教士开始认识到，在中国宣扬福音，非有优级的、受过正规训练的传道人才不为功。1907年基督教在华宣教百年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便称：“虽然我们仍在宣教事工中使用那些成年入教而未受正规训练之人，但我们不应靠他们来满足教牧事工的需要，而应为此目的在有良好设施之学堂和书院从小训练信道学生，并引导他们把教牧事工视为最有价值和最荣耀的终身事业。”^①在华主要西方差会已不再满足任用“崽者、司阍、贾贩、改行的传教师”等“半路出家之人”为宣道士，而把眼睛转注于三考出身的学生，学院式神学教育开始取代学徒式神学教育，成为中国神学教育的主导方式。

然而学院式神学教育，或狭义的、正式的神学教育，包含很广，从最低级的圣经学校到最高级的神学研究院，从独立神学院到教会大学神学院，从某宗派独办神学院到多宗派合办神学院，又有种种区别，因此有必要根据不同标准对所谓学院式神学教育作以下基本的分类：

以入学程度对神学院分类 以入学程度来区分神学院校，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做法。早期教会对神学教育只有高级、低级的简单区分，1914年中华续行委办会神学教育委办，称当时全国有各种神学机构不下143个，该委办显然对神学教育作了广义的解释。^②1917年发表的关于神学教育的“毕来思报告”，则把其调查范围限制在“不少于两名教员和一年开课不少于五个月”的神道学

①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Records: Report of the Great Conference held at Shanghai, April 25th to May 8th, 1907*, 476.

② *Tentative Repor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Theological Education,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25)*, 429.